
書評

評介*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羅久蓉*

書名：*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作者：Wang Zheng

出版時地：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頁次：402 頁

一、前言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習慣用「婦女能撐半邊天」為中國大陸的女權運動解套，只要祭出這面欽定大旗，很少人去探究其中真正的涵意，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是現狀的反映？還只是對未來的期望？是口號？是行動？有人即使有意見，也按下不表，因為毛主席的智慧不容置疑。於是，這句話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複述，早已籠罩在一道迷迷濛濛的光環之下，不但中國老百姓朗朗上口，西方學界也照單全收。問題是：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婦女真的已經撐起半邊天了嗎？這是本書要回答的一個問題。

作者王政 1982 年從上海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後，在中國大陸任教一段時期後赴美深造，1995 年取得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學博士，本書即脫胎於她的博士論文。王政的成長與教育背景使她在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問題時佔有一些優勢，例如她能很快切入近代中國女權運動的核心，提出重大問題，而在質疑中共意識型態與政治八股的同時，也不忘將問題放在時代脈絡下來考察，除此以外，美國研究所社會理論與比較歷史學的訓練，使她具備理論思考與比較研究方法的條件。雖然她對中國近代政治史的掌握稍嫌薄弱，但整體而言，這是一本問題意識清楚，而且經過深思熟慮的書。本書的第二部分，作者以訪談五位女性的口述記錄為基本史料，與第一部分提出的議題前後呼應。五位女性歷經國共兩黨政權統治，在中共統治下遭遇不同程度的迫害與蔑視，她們的自我表述不約而同呈現婦運所面臨的困境。最後，雖然本書處理的主要是屬於婦女史範疇的問題，卻能超越狹隘女性主義的關懷，從兩性角度思考問題。

作者從論述角度來檢視中國女權興起發展的過程，發現中國近代婦女自主意識之提昇，在相當程度上，仰賴男性同胞的引領提攜，可以說，清末以來，中國男性致力於打破傳統加諸於婦女的桎梏時，一直扮演指導者的角色，不過他們提倡女權的動機與其說是為了婦女，不如說是為了國家、民族更為恰當。康有為等「大」知識份子很早即意識到要中國強盛，婦女地位必須提高，而提高婦女地位的關鍵不外提昇婦女教育水準。之後，隨著政治勢力的介入，論述的內容與型態日趨複雜，唯一不變的是，當婦女自主意識與社會生存能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往往發現男性先知們當初為她們謀劃的議題與行為規範，不一定是正確的，於是就開始挑戰男性價值觀

念，這種情形從民初持續至今。作者把近代中國女權論述放在時代脈絡下來檢討，她關注的焦點包括女權論述的歷史延續性、與其他論述之間的關係，以及性別在女權運動發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產生的影響。她挑戰的對象不只限於五四時期男性對於婦運的解釋，她也質疑一個政權對於婦女運動的敘述，其中不只關係到兩性差異的問題，還涉及政治權力與中國近代婦運成長的關係。

二、內容介紹

在近代中國女權發展史上，五四運動代表一個新局面的展開，反傳統思潮的興起使知識分子普遍注意到長久以來中國婦女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壓制與不平待遇，而隨著女性受教育人數的增加，報章雜誌開始發揮影響力，透過男性知識份子的鼓吹和介紹，男女平權思想一點點滲入人們的思維之中。另一方面，雖然五四代表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但並不表示中國女性論述始於五四，就如同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一夕爆發，五四時期的女權論述也非驟然形成，而是接續晚清知識份子面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所產生的自我反省。

本書從五四時期女權主義論述的角度切入，上溯清末，下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婦女問題，使讀者對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發展的來龍去脈得到一個比較完整的概念，這與過去相關研究多將近代中國女權運動起源溯自五四時期，有明顯的不同。作者指出，許多五四時期流行的概念早在清末即已出現在知識份子的言論及雜誌中，但是因為當時社會條件尚未成熟，只能發揮有限的影響力。以往多位學者研究白話文運動與民族主義發展過程，均注意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傳承。在婦女史的領域中，雖然大家承認康梁對婦女問題有獨到的見解，但對他們為何無法超越當時的時代，則未深入探討，本書從出版論壇與婦女教育兩方面，對這個現象加以闡述。對婦女運動而言，五四的重要性不在觀念的創新與發明，而在深度與廣度之

加強，對後者而言，傳播媒介與對象等條件是否具足是決定知識普及的要素。這種條件在五四時期無論在出版或外來新知識的引進方面，都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峰。

五四論述形成的歷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它的內容特色。

五四論述的特色之一為它是依附在民族主義論述之下的一個次論述。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陰影揮之不去，女權運動的發展過程與清廷、軍閥、國民黨、共產黨的興衰式微盤根錯節，影響所及，民族主義成為女權論述最主要的對話對象之一。誠如作者所言，作為一個議題，「女權」最初是依附在「人權」之下提出，此舉固然在某種程度上減低了男性對女權運動的排斥與抗拒，有助於婦女爭取自身權益的努力，但有時也會對女權產生牽制作用，特別是在個人利益與國家民族利益發生衝突時，婦女權益往往是第一個被犧牲的對象。簡言之，對近代中國女權運動而言，民族主義是一刀兩面，同時具有提升與抑制的作用。這不只是一個理論性問題，也有它豐富的現實意涵。

近代中國女權主義論述與民族主義論述之間的糾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達到另一個高峰。當時因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挫敗所引起的民族主義高潮為新文化運動凝聚了焦點，當時中國表面上已經建立共和體制，然而軍閥割據，國事蜩螗。在這種情況下，傳統儒家三綱五倫取代了滿清朝廷，成為眾矢之的。這時期的女權論述雖然仍舊依附在民族主義論述之下，但由於是建立在一個超越性別的前提之上，從屬關係並不是那樣刻板，女性論述的主體性因此得到較大的發揮空間，這主要因為五四知識份子在挑戰傳統儒家倫理道德價值體系時，開始意識到中國封建體制的迫害波及整個社會，女性固然是父權思想的犧牲者，身處宰制地位的男性同樣也被壓得喘不過氣來，這也是為什麼〈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在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時，把婦女解放解釋為人的解放，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女子和男子一樣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個體，理應受到尊重。

五四女權論述的第二個特色是它深受西方女權論述影響，不過二者的

關係也和與民族主義論述之間的關係一樣錯綜複雜。由於當時外來影響不只一端，女權倡導者的選擇也呈現多樣性。一方面，我們在五四女權論述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西方近代人權思想發展的軌跡，如清末中國知識份子在接觸西方自由人道主義思想的同時，也接受了達爾文社會進化論所衍生的樂觀進步觀念，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依循一個普世皆準的歷程，不斷前進，凡西方社會所走過的道路也必然適合東方古老的中國，由於婦女解放代表一種進步的價值觀念，因此，許多作者在介紹西方女權運動及概念時，對中國眼前的落後並不特別在意，因為今日落後並不表示永遠落後，反而因為有所借鑑，正可三步並作兩步，加速迎頭趕上。如享有「中國盧騷」美譽的金天翮在宣揚男女平等、尊重個人等女權觀念時，即是根據盧騷天賦人權的觀念，加以發揮。又如五四前後周作人、胡適等人引進日本、歐美等地對於婦女解放最新的言論，也是站在人的立場，強調婦女的「獨立人格」，易卜生〈傀儡家庭〉劇中的娜拉遂成為新女性的代表。另一方面，1917年俄國大革命之後，社會主義女權論述也被引進中國，形成一個爭鳴的局面。不過，無論以個人人權或集體社會福祉為訴求，這些外來的女權論述都必須通過本地傳播媒體與傳播對象的一個吸收互動過程。誠如作者所指出，中國女權運動雖然深受同時期西方女權運動的影響，但在表現形式上仍然展現本土文化的特色。

五四女權論述的第三個特色表現在男性的積極參與上。清末女性參加革命、辦雜誌，所在多有，但比例上仍是少數，這與受教育人口的兩性比例以及在一個新舊交替時代的男女角色分工有關。因此造成一種現象，從清末到五四，女權論述的主導者基本上以男性知識份子為中心。可是男性在提倡女權的同時，也替婦女解放運動製造了一些問題：男性把「婦女解放」置於「人的解放」議題之下來處理，固然立即賦予「女權」論述一種能為社會普遍接受的合法性，卻也模糊了兩性之間真正的差異，使正宗女性議題無法充分彰顯。在這裡，作者從女性的角度，對男性女權主義者的心理狀態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五四男性知識份子為爭取婦女權益大聲疾呼，固然表現一種超越的人道主義關懷，但也不妨將之視為他們與傳統文

化疏離後尋求自我「再現」的一種手段。當魯迅等男性知識份子以婦女解放的導師自居時，他們言行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卻不一而足，他們自詡為女權的捍衛者，卻在現實生活裡不自覺地流露出傳統男尊女卑的心態，無意以平等對待女性。其結果是，女權主義者才擺脫傳統父權宰制，轉眼又落入另一種形態的父權宰制的掌控。更重要的，由於眾多男性視婦女解放為手段，而非目的，五四婦女論述內容隨國內政治情勢而轉變，女性的自主性議題一再遭到淡化，終至走樣。

面對如此複雜的現象與眾多議題，作者的策略是以〈婦女雜誌〉為主軸，分析編輯方針與文章內容，以及編者、作者、讀者之間的互動，來探討五四女權論述的演變過程。〈婦女雜誌〉是由商務印書館發行的一份刊物，無論就發行或作者群而言，它都稱得上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婦女刊物，又由於它是一份商業刊物，具有一定程度的市場取向，不過這並不妨礙它在編輯方針與文章內容上反映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對婦女問題的認知與態度。從〈婦女雜誌〉1915年創刊到1929年停刊的十年間，中國政治從軍閥割據逐漸走上統一，雖然離真正的國家統一尚有一段距離，但自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以來，中國政黨的力量增強，政治權力趨於集中。這些因素直接間接影響到女權論述的形成與發展。

就論述形態而言，作者將〈婦女雜誌〉分為保守、個人自由主義、集體社會主義幾個時期。

(1) 保守時期(1915~1920)：這時期的編輯方針偏向保守，參與論述者以男性為主。女權論述基本上以賢妻良母為訴求，女子教育與健康是關懷的重點。編者徘徊在新舊兩種價值觀之間，儘管面對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猶兀自希望留住時代的腳步。於是他們一方面鼓吹女權，一方面繼續鼓吹婦女同胞以家庭為重。這種矛盾心理反映在他們所提倡的「賢妻良母」觀念上；對中國女性而言，家庭固然是職責所在，但只是作為救國救民的一種手段。這與十九世紀美國女性以家庭幸福為目的的訴求有明顯的不同。除此以外，論者在伸張女權（儘管內容保守）時，處處以女性改造者

自居，把傳統中國女權不彰的現象歸咎於女性自身的不足與缺失，然而在女性讀者看來，這種「聲援」與「聲討」幾無二致。

(2) 個人自由主義時期(1920~1925)：1920 年〈婦女雜誌〉編輯易人，新主編章錫琛以提倡性解放與重視婦女權益著稱，新人新政，在雜誌內容方面作了大幅更新，撰稿人也變了，改由五四新文化運動份子擔綱，他們介紹天賦人權、男女平等等西方概念，藉以提升中國女性自主意識。由於受教育婦女人數逐年增加，社會上就業機會逐漸對婦女開放，女權論述雖然仍以男性為中心，但愈來愈多女性開始表達她們對於婦女問題的看法，如〈婦女雜誌〉推出一系列專號，討論離婚、墮胎、自由戀愛、獨身主義等議題，參與者之中即有不少女性。

(3) 集體社會主義時期(1926~1929)：馬克思主義女權論述隨著共產主義進入中國，吸引了許多對蘇聯社會主義抱有憧憬的五四知識份子。反諷的是，馬克思主義對婦女解放並不特別重視，甚至在這個議題上並未提出具體綱領，然而當它來到中國，卻對強調人權與個人的自由主義婦解論述產生莫大衝擊，甚至把原來女權論述的重心從文化、道德層面轉向法律、經濟、政治層面，影響不可謂不大。這是辛亥革命以後女權論述再一次依附在民族主義論述之下，雖然內容已由反滿轉為國共兩黨的政權爭奪戰。作者指出，1926 年中共正式出擊，刊登在〈中國婦女〉上的一篇文章把章錫琛等人在〈婦女雜誌〉上所宣揚的自由派婦女解放理念批評得體無完膚。該文作者指出，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或許能改變人們對婦女的偏見，但卻無法增進婦女實質權益，更不能改變婦女在法律、經濟、政治上飽受壓迫的事實，兩性平等必須透過法律途徑加以保障。同時，這篇文章提出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是廢除私有財產制的說法，也就是說，婦女為得完全解放，首先必須獻身無產階級共產革命。

在作者看來，此一論述方向的逆轉對中國女權運動造成的衝擊非同小可。從辛亥革命到共產革命，婦女論述與民族主義論述始終糾纏不清，唯一的不同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自由派女權主義論述把重點放在文化的提

升，並認為個人意識的覺醒與國家進步之間沒有必然的衝突，不但沒有衝突，個人提升反而是符合國家集體利益的，真正把二者對立起來的是中國共產黨，雖然中共向來號稱「婦女能頂半邊天」，但口惠而實不至，中國婦女的權益在無產階級革命高於一切的前提下，一再被置於黨與國家利益之下，兩性地位始終未臻平等之境，這可能是歷史最大的反諷。

第二部份是作者對中國大陸五位年逾八旬的女性長者進行口述訪問的結果，這五人的政治成份各不相同，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員、民主同盟份子，也有不帶任何政治色彩的社會人士，她們所學不同，遭遇互異，但兩個共同的經驗，卻把她們連結在一起。其一，她們都曾接受過五四時代女權運動的洗禮，具有強烈的女性自主意識，並分別在各人專屬領域內創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其二，自 1949 年中國共產黨統治，她們的命運開始走下坡，彷彿那場政權轉換將一切重新定義，包括她們追求女性獨立自主的生命歷程，她們的過去成了現在的包袱，她們自此從十億人的記憶中消失。四、五十年後作者訪問她們時心頭的悸動，適足以說明中共是如何成功地控制了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

中國共產黨怎麼辦到這點的？

原來中共掌握政權後，即透過小說、電影、傳記、戲曲各種不同的形式，把 1949 年以前的中國女性分別歸於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參加共產革命的女英雄；第二類是共產黨拯救的對象，這些人在舊社會飽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摧殘，共產黨的到來改變了她們悲慘的命運。第三類是在剷除之列的小資產階級「太太」們，她們代表一個腐化、貪污、剝削的封建階級，社會主義中國沒有她們立足之地。於是，在這個由「革命」與「階級」構築的記憶框架中，從清末到五四女權主義與婦解運動是不存在的，好像有史以來所有和婦女解放相關的討論都只圍繞在革命與階級兩個議題上打轉。中共婦解女英雄樣板最突出的特質既非獨立人格，亦非自主性，而是服從與忠貞，服從黨的紀律，忠於黨的領導，共產黨是一切生命的源頭，離開它就是死路一條，女權主義者亦只能在這個框架下苟活。

中共對婦女解放論述的掌控帶有相當強烈的排他性，這種排他性表現在它如何呈現、定義、規範中共所謂的革命女英雄上，例如在表揚向警予對革命的貢獻時，中共清楚地把她定位在黨成功地指導婦女解放運動的脈絡下，一切功勞歸於黨，而與此相對的是其他「錯誤的」婦女運動。在看似進步的表相之下，「政治正確」成了中心指導思想。

面對由黨機器控制的女權論述，本書作者所要呈現的是被中共消音的其他女性論述。五位受訪者之中，陸禮華是一位從事體育教育的女校長，朱素萼業律師，王伊蔚是雜誌主編，陳詠聲也是從事體育教育的教育家，她們都不是中國共產黨員，1949 年以前她們在事業上的成功表現與中共也沒有任何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她們不屬於上述三種類型的任何一類。如果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她們在中共統治下鬱鬱不得志，那與中共淵源甚深的黃定慧一生的坎坷遭遇又該怎麼說呢？黃定慧年輕時因逃避婚姻投入共產黨的懷抱，成了一名以革命為職業的女共產黨員，然而家庭與黨孰輕孰重、孰先孰後，始終是她個人生命中難以解決的難題。對這樣一個掙扎在現代女性困境中的革命家，黨回報她的卻是精神的污蔑與肉體的懲罰。1955 年她因潘漢年漢奸案牽連被關，1963 年出獄，文革時再度下獄，1975 年出獄，1980 年始獲平反。

事實上，中共給與婦女參政的空間從來就不是很大，一旦遇上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個人就只能自求多福了。書中提到的五四新女性劉王立明的遭遇是另一個例子，劉王立明是 1922 年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曾參加婦女參政運動，是上海地區婦女運動活躍份子，她主張透過實行議會制的民主社會主義，爭取婦女經濟地位平等，伸張社會正義，因為反對階級鬥爭，對中共懷有戒心，早年一度與國民黨有過接觸，淪陷期間丈夫在上海遭日本特務暗殺，抗戰勝利後加入民主同盟，遊走在國共兩黨政治圈外，中共建國之初，劉王立明以民盟代表身份當選政協委員，但 1957 年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傾份子。1966 年文革爆發，9 月 1 日劉王立明被捕入獄，罪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情報員，1970 年 4 月 15 日死在獄中。

三、討 論

綜上所述，即知本書內容豐富，涵蓋面相當廣泛，作者試圖以雜誌文章與口述訪問資料建構出一個近代中國女權論述的架構，然後在這個架構之上回答若干歷史的問題，包括中共如何以它自己的方式，操縱了十幾億人口的歷史記憶，作者在訪談過程中傾聽受訪者細述人生經歷時所表現的從驚訝到同情種種反應，適足以顯示數十年來中共如何成功地掌控了女權論述的走向。

本書採用的兩種形式的史料各有其侷限性；口述訪問的問題在於五至六人的經歷的代表性究竟如何，畢竟，她們的遭遇在數億婦女人口中可能只是少數，作者是用它們來呈現問題，還是想藉此說明、陳述問題？如果是前者，取樣似乎不夠充分，如果是後者，有可能對議題造成另一種扭曲，當然作者也借用其他文字資料討論中共如何對待其他與政權更為接近的婦女的遭遇，來說明中共的婦運政策，但由於五人口述訪談資料構成這部份論述的核心，因此這問題仍須正視。除此以外，針對某項特定研究議題從事口述訪問，由於訪問者心中已經有了某些定見，極易不知不覺對受訪者加以引導或將自己的意見強加諸於受訪者口中，雖然作者在這方面具有高度自我警覺性，但由於書的整體架構預含前後呼應的需求，因此這種「再現的再現」的陷阱有時很難避免。

以雜誌為分析對象的好處在於簡單明瞭，困難在於我們很難精確估量文字所產生的效應，同時，一本雜誌的盛衰消長是否足以作為中國女權運動走向的指標，似乎也不無商榷的餘地，尤其當這走向在某種程度上是決定於雜誌的編輯與出版社基於不同價值觀念的考量時，更要避免過度推論。我們自然不必全盤否定研究者見微知著或別有會心式的觀察，但必須有充足史料作為支撐。

以論述方式處理歷史問題，有其方便可取之處，別的不說，看完本書，我們對於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發展過程中的重大議題有一些概念性的了解。

另一方面，為了充分開展討論的空間，以及更清楚地呈現議題，有時也免不了要犧牲一點歷史事件背後的複雜性。

不知是否因為本書質疑的主要は中共的婦運政策，以及伴隨而來中共政權對歷史記憶的玩弄與操縱，中共的形象顯得特別突出，在本書中，中共不但從反面接續了五四傳統，且在中國政壇快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二〇年代中即成為中國有份量的政治勢力，有時甚至超過歷史事實所承載的份量。舉例言之，作者對〈婦女雜誌〉刊載文章進行分析，得出女權論述歷經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三個不同階段，並以 1925 年為中國近代女權論述政治化的重要轉捩點，女權議題討論的重心自此從文化、道德、心理面轉向政治、法律、經濟面。理由是中共的加入論戰，代表五四自由主義論述受到馬克思社會主義論述的挑戰。但為什麼是 1925，而不是 1924，1927，1937，或 1949？如果承認論述作為一種分析概念，與政治權力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則 1925 年的中共手中掌握的政治資源顯然有限，因為就在這之前一年，中共當局決定讓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在這個國民黨稱為「聯俄容共」，中共則稱為「聯俄聯共」的合作關係中，以及在 1926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過程中，中共動員群眾，成績斐然，有目共睹，然而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當時共產黨是打著國民黨的旗號，以細胞滲透方式活動。另一方面，即使從單純論述的角度，我們也不能排除國民黨左派所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雖然在中共與國民黨左派之間仍須作適度的區分。總而言之，在女權論述政治化的過程中，中共既不是論述唯一的主導者，也不是動力的來源，應該說 1924 年國民黨改組之後，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起了變化，但這現象同樣適用於國共兩黨，並不只限於中共。

作者討論中國女權論述的起源與發展過程時，利用中西比較觀點，做出一些發人深省的觀察，但是對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異同則未多著墨。原因之一可能是，作者雖然自覺中共政權對歷史記憶的操控，但卻沒有真正跳脫中共的歷史思維。對抗歷史失憶唯一的方法就是讓歷史的歸於

歷史，如果 1925 年是女權論述政治化的一個分水嶺，則 1949 年的重要性實不亞於 1925 年，那以後，國民黨退走台灣，中共全面控制中國大陸，泛政治化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峰。事實上，欲瞭解 1949 年以後中共的婦運政策，必須對照 1949 年以前的中共作為，而要瞭解 1949 年以前中共婦運動政策的演變，國民黨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對照面。從 1926 年武漢分共到 1931 ~1936 年間國民黨五次剿共、中共退走延安，中日戰爭爆發，中共開始壯大，抗戰八年期間兩黨摩擦不斷，貌合神離的關係在不同階段隨外在形勢變化而有所不同，其中不僅牽涉到意識型態的分歧，更表現在不同的權力運作方式上。

為什麼中國大陸許多像王伊蔚一樣的前輩女權主義者，在中共取得政權後，才發現中共背叛了她們。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多少是歷史背景使然？多少是基於革命政治上的考量？書中提到多位受訪者 1949 年以前都認識的錢劍秋、周文磯等兩位女士，但著墨不多，錢周二位遷台後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經歷可以告訴我們什麼？這其間的異同，除了個人因緣際會，分屬兩個不同政權以外，有無制度或組織層面的因素？對國民黨 1925 年以後的婦運動政策，作者在引述受訪者若干負面的評語之外，幾乎沒有討論，其實這才是我們瞭解中共婦運動論述一個重要的比較觀點，尤其作者透過五位受訪者對中共女權論述進行批判之後，卻沒有從國民黨的角度對中共婦運動更深入的探討，予人意猶未盡之感。

除了國共比較，隨北伐以後政治權力集中而來的是泛政治化的「關切」與「指導」。就權力本質而言，這與軍閥時代大不相同；五四時期各種思潮的蓬勃發展正是因為軍閥割據所形成的政治真空，表面上，軍閥的專橫獨裁與民主政治標榜的開放自由截然不同，實際上，軍閥政權汰換率之頻繁，軍閥素質不一，在在降低了暴力事件的恐怖，而當政治權力四分五裂，產生相互消融效應之時，思想的自由度與發展空間相對增加。例如，五四時期許多知識份子為國家主義所吸引，但這些人在現實政治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關鍵在於缺乏組織，至於無政府主義，那更是不在話下。論述的

侷限性由此可見一斑。

在結論中，作者發現經過一個世紀，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又回到了原點，亦即，中共的女權論述儘管在形式已經起了變化，但就本質而言，它與清末民初的女權論述並沒有根本的差異；女性權益依然是手段，不是目的。作者如何得到這個結論？基本上她先根據五四時期《婦女雜誌》的內容與編輯方針，探討五四女權論述的各個主要議題，然後利用這份五四婦女雜誌的文本，在五位歷經五四運動、國共合作、與中共統治的女性身上尋找關連，進行驗證，標示她們與過去之間的聯繫，如測試受訪者對於一些時常出現在五四雜誌文章中如「獨立人格」、「自主性」等詞彙的熟悉度，受當時女權主義者刻意塑造的女性英雄人物如「花木蘭」等的影響。然而一般人對詞彙或形象的理解，可能因時因地而有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能夠證明這種關連性，意義何在，仍是一個問題。除此以外，論述絕對不是過去、現在、未來之間唯一的聯繫，從多位受訪者的口述經歷，我們知道她們之所以興起或接受女權思想，和個人在家庭、婚姻中的經歷有很大關係，這並不表示作者所歸納出來的幾個論述不正確，而是應該警覺論述本身有它一定的限制，由於論述之建構必須仰賴許多其他條件的配合，在論述再現過程中，如何把它放在適當的歷史脈絡之中，可能需要特別留意。